

周恩来在教育、科技领域批判极左思潮

毛泽东：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份

周恩来：红线也是照耀教育战线的

“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上大学”

他指示周培源“把北大理科办好”

周恩来决定组建高能物理研究所

教育、文化领域是毛主席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也是政治上的敏感区。周总理不能像对其它他领域那样批判极左思潮，不然的话，就会同毛主席迎头相撞。尽管如此，周总理出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仍然就某些极左错误进行批评和纠正。科技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周总理能够更坚决地纠正极左错误。

1971年7月6日，周总理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会上关于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对17年教育战线的估计也有所松动。他曾经指出：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

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无视这些意见，仍然主张全盘否定。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建国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教师以至广大知识分子的重重的精神枷锁。

1972 年 10 月 14 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和夫人，就国内教育和科研问题发表谈话。关于教育，他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关于科研问题，要求在座的国内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华罗庚等）应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提高。周总理向李政道建议：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周总理的这些想法，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当时要这样做，同“左”的“教育革命”方针是不相容的。要派研究生去美国深造，更是大逆不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煽起的“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出版方面造成严重恶果。建国后 17 年出版工作的巨大成就，被全盘否定，领导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到 1971 年，全国的出版工作，除了出版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小学课本外，其他图书基本陷入停顿状态。许多知识分子为了避免遭到批判，不敢写作，出版社不敢出书。书店里只卖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其他的图书被视为“封资修”不敢出售。大多数图书馆也封闭起来。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求读书，既买不到，又借不到，以致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当时，在中央分管宣传和文教工作的张春桥、姚文元，对人

民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周总理于 1970 年 9 月 17 日召集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和出版部门的负责人，针对群众反映“中小学生没有字典用”“青年人没有书看”等问题对出版工作提出批评。他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编的芭蕾舞剧，基础是原来的，内容却是新的，形式又有了改变。这就叫做洋为中用。周总理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法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周总理强调，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出书、出好书，解决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指定科教组负责组织力量对《新华字典》进行修订，争取早日出版发行。但是整个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无人来抓。因为主管出版方针、政策的中宣部和主管出版行政管理事务的文化部已被“砸烂”，文化组、科教组都不管出版工作。江青集团日夜想的是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只顾破坏，根本不负责任。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如果江青集团来抓出版工作，不仅不能解决面临

的问题，而且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此，周总理也不会请他们出面解决。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只好亲自来抓。

1971年3月初周总理决定3月15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并指定我具体主持这个会议。对出版工作我是门外汉，承担这个任务困难很大。可是，我想到当时的困难情况，勉为其难，接受了这一任务。我们组织了一个会议领导小组，有一部分富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参加，自己不懂的事情，虚心向大家学习，特别是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并及时向总理反映情况，重要事项都向总理请示。周总理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曾先后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审阅会议起草的国务院向党中央的报告。4月12日第一次接见从凌晨1点开始，5点20分结束。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详细询问了许多情况，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并对如何纠正极左错误作了具体指示。会议于7月22日结束。7月29日，周总理在接见其他会议代表时，一起接见了出版会议的代表。

在二次接见中，周总理针对林彪、江青集团对出版工作的干扰破坏，深刻地批判了他们鼓吹的形而上学，割断历史，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周总理指出：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历史书都没有，地理书也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当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

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做出判断的。一面说青年人没有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这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 这完全是思想垄断 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哲学等。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党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把出版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同时应该做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参考读物，青少年读物，文学艺术读物 科学技术读物 经济、历史、地理、国际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各类图书，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出版工作。

周总理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对出版他们需要的文学作品和工具书、科普读物等，都作了详细的指示。周总理还指示，要研究制定一个出版计划，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写作，有些旧书可以重印，图书馆应该清理开放。在谈到出版队伍的建设时，周总理明确提出，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周总理还很关心毛主席批准的二十四史的校点出版工作，指示从全国调一批专家从事这项工作，并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负责总其成。在出版会议期间，我曾前往拜访顾颉刚先生，向顾老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顾先生表示，十分感谢周总理的信任和重托，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这一任务。

周总理在批判极左思潮时，不点名地批判了陈伯达的假革命、野心家、两面派的真面目（当时 陈伯达的问题还没有公开）；批评了破“四旧”时不分青红皂白 违反政策 破坏文物的错误；还批评了中南海有些人胡造反，将紫光阁后院的乾隆谕旨碑和紫光阁前面的石狮子 以及清朝摄政王府（今第四会议室）门前

的石狮子搞走的错误行为。周总理说：乾隆谕旨碑上有一句话“下马必亡”。这是乾隆教育他的后代，不要贪图享乐，不要忘记战备。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警惕和防止产生这类问题。周总理责成我查找石碑和石狮子的下落。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帮助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把石碑、石狮子找回来，并请人将损坏的地方修补后，放置原位。我看过那座石碑，由于年久风化，碑文中有些字迹已经不清楚，没有看到“下马必亡”几个字。但碑上刻有“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等语，也就是“下马必亡”的意思。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一直称那座碑为“下马必亡”碑。

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起草了国务院给党中央的《关于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并草拟了一个出版计划。《报告》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党的核心小组，把出版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目前，第一书记应抓一下出版工作。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后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贯彻执行。这个《报告》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总的精神是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报告》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抓出版工作的胆子大了，积极性高了，加上广大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买书、看书难的问题较快地得到解决。以后，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出版事业管理局，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那个时候，斗争极为复杂，有人利用出版为林彪篡党夺权造舆论。例如有一个省编了一本画册，名为《井冈山的斗争》。第一张画是林彪带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要求列入出版计划，在全国发行。我报告了周总理，总理指示：“这是歪曲历史，压下来，不答复”。还有一个高级干部写了一本书，大肆

吹捧林彪,也要求列入计划 在全国发行。并且几次打电话、发电报催办。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 压了一段时间 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 此事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以来 我国的科研 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 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加大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周总理对这种情况早有批评。1972年7月2日,周总理会见杨振宁博士 对他提出的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建议 表示赞同。7月14日 对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7月20日,周培源教授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老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意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并提出改变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的建议。7月23日,周总理将周培源教授的信批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要他们好好议一下,并认真实施。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教授根据周总理多次指示精神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 工和理 应用和理论 都必须受到重视 不可偏废 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 周培源有后台 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 就是要批!随即指使人撰写批驳文章,对周培源教授的文章进行围攻。

8月10日,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就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但张春桥却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求在会议《纪要》中写入“黑线专政”。周总理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 坚持不让在会议《纪要》中写上“黑

线专政”，以保护科技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科学工作者。会议最后形成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经国务院批准后下发。

9月11日周总理同意张文裕、朱光亚等18名科学工作者反映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工作落后，要求改变现状的来信。复信时说：看了来信很高兴，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要把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之后，周总理同二机部、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研究确定：组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以加强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吴庆彤）

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波三折

毛泽东：“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

邓小平批准《高校六十条》的出台

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经历四个阶段

1951年钱俊瑞提出“毛泽东教育思想”概念

研究概况

建国以来，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可分以下两个时期。

1. 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

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5年）

这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是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和理论为基础的。

1949年12月徐特立在《新建设》上发表《科学化民族化大

众化的文化教育》一文，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

1951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俊瑞为纪念中国共产党30周年而作的《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一文。《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以此文代社论发表。《新华月报》8月号转载此文时加的编者按说：“这篇论文对毛主席教育思想的特点、内容作了系统的介绍和阐述。”

钱俊瑞的文章提出：(1)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必须深刻领会毛泽东对于教育工作的指示；(2)新中国的教育是人民教育，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3)新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也就是毛泽东所指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4)新中国的教育是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法，应该是毛泽东提倡的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5)毛泽东的博大精深的教育学说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毛泽东是伟大的人民领袖和伟大的教育家。这篇文章在全国教育界的影响很大，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起了积极引导作用。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教育工作的一些重要指示，如1950年6月毛泽东就学生健康问题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的问题；1953年6月，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问题，都进行了广泛地学习和讨论。

第二阶段（1956—1965年）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政策问题。

这一阶段共10年，又可分为两段，即：1956—1960年前5

年为一段；1961—1965年后5年为一段。

1956—1960年：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到开展“教育革命”。

为了适应全面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纠正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出现的生搬硬套的缺点，突破苏联教育经验的局限性，建立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和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热潮。报刊杂志上纷纷发表学习、领会、阐述、解释毛泽东教育方针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人民教育》1957年9月号发表的社论：《认真学习大力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是从老解放区到建国后教育工作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是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它适用于各级学校，是今后长期的教育方针。

对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从理论上阐述的文章有徐特立的《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和成仿吾的《论教育方针》等。

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在《工作方法》（草案）中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法提出了具体意见，要求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试办工厂、农场或与当地的工厂、农村订立劳动合同，组织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

1958年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有关教育论述的基本线索。这本书成了全国教育工作者必读的教科书，对毛泽东教育思想在全国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阶段阐述党的教育工作方针的文章主要有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徐特立的《劳力与劳心并进 手和脑并用》、成仿吾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等。

1961—1965年：在教育事业调整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改革探索。

1958年开展的教育革命，对促进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缺点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伤害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忽视了课堂教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

为了纠正“教育革命”中“左”的错误从1961—1963年对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

1961年，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总结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探索走自己的道路的经验，讨论通过了教育部草拟的高校六十条。毛泽东亲自审阅了这个条例，高兴地说：“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1963年，又制定了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这样，我国各级全日制学校有了一套基本法规。

1964年以后，教育事业经过调整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就教学改革问题作过多次重要指示，其中对我国教育界影响较大的有三件：

(1)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亦称春节座谈会）毛泽东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

的 但是办法不对。’他批评学校课程过多 使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2)1964 年 3 月 10 日 毛泽东《对‘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3)1965 年 7 月 3 日 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 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的批示》(简称《七三指示》)指出：“学生负担过重 影响健康 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围绕毛泽东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掀起了群众性学习高潮。1964 年 3 月 22 日，教育部和北京教育局邀请北京市部分中学校长和中小学教师座谈讨论如何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改进教学工作，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光明日报》加编者按语发表了座谈会的纪要，对全国的影响很大。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纷纷召开座谈会，报刊也作了大量报道。

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1964 年 6 月，参加过春节座谈会直接听到毛泽东谈话的杨秀峰认为：对于毛主席的指示，千万不要简单化地理解。如砍掉一半，并不是叫你机械地砍掉二分之一。考试可以交头接耳，这是形象化的说法，意思是要用各种方法使学生学活。开卷考试是可以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创造性地学习，但并不是说门门课都开卷考试。毛主席讲古代最有成就的，并不是状元。如果我们的学生只为五分而考试 就和考状元差不多了。毛主席指示的精神 最重要的

是：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二要使学生的学习成为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创造性的学习 要做知识的主人 不要做书本的奴隶；三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创造出的一套适合我国情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教育制度。

1965年8月，蒋南翔也指出：毛主席关于从学生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的指示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各校应结合本校具体情况，正确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第三阶段（1966—1976年）

这个阶段的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学习和宣传，是以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为标志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作为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纲领而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和贯彻的群众运动高潮。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收录了1927年至1967年间，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论述、书信和语录等共51条。其中大量选用的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言论，但是也包括晚年的一些错误思想。就是那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正确言论，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环境下，也往往被歪曲、篡改、被实用主义的曲解和利用，失去其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一阶段的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学习和宣传，谈不上真正的学习，更谈不上科学意义上的研究。

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6年10月—1981年5月）

这个阶段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1977

年 7 月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 亲自主管教育工作 并具体指导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这个阶段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正确估计建国 17 年的教育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教育思想以及毛泽东晚年在教育上的失误。这是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关心和感到困惑的问题。邓小平在 1977 年 8 月《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 年 9 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8 年 4 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他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和提倡的，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 1957 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 60 年代初期是支持高等学校六十条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把毛泽东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对全国教育战线 17 年的工作怎样估计，主导方面是红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的。邓小平关于教育工作的几次重要讲话澄清了是非，为新时期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指明了方向。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蒋南翔在《总结十七年办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经验》、张承先在《当前教育战线的形势和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董纯才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开幕词》中都结合教育战线的实际，对正确对待毛泽东教育思想，正确估计 17 年的教育工作作了具体阐述。

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政治批判性文章、座谈会发言或笔谈较多 系统的研究著述较少。

第二阶段 1981 年 6 月—1984 年)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教育战线出现了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并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教育实践加以运用和发展的新局面，这一阶段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的开拓前进的阶段。

1981年8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蒋南翔在报告中，就如何评价毛泽东教育工作的指示问题提出了原则意见，认为在教育工作上，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和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思想。会议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按照《历史决议》的精神，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认为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都是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是错误的。但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对教育工作的指导作用。这次会议对正确评价毛泽东教育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起了正确导向作用。

《教育研究》从1981年7月号起连续将近一年的时间刊登教育理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论述，探讨毛泽东教育思想体系的内容及其形成和发展的文章、论文，计20多篇。如张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而作的《党领导创建了伟大的人民教育事业》一文，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作了系统阐述。

1982年5月，中国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与华中师范学院在武汉举办了毛泽东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以来教育理论界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的专家学者首次研究讨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聚会，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50多人出席，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科学含意，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建国以来毛

泽东教育思想的评价以及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大意义等作了讨论。这次会议对组织全国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理论队伍起了一定作用。会后部分论文编成《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文集》。

1983年毛泽东诞辰90周年前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活跃起来。12月24日，教育部在北京隆重召开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大会，何东昌作了题为《在教育工作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讲话。讲话对毛泽东丰富的教育实践，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回答和解决我国教育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了全面阐述。中央和各地报刊发表一些老同志和教育理论工作者撰写的纪念文章，一直持续到1984年。

这一阶段的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拓宽和加深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

一是从横向方面，扩展了领袖群体中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论述的研究。以《教育研究》为例，该刊的创刊号以卷首的地位，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基础科学和理科教育的论述 摘编》以及周培源的《继承周恩来同志遗志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提高理科教育质量》。1984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周恩来教育文选》，1985年，《教育研究》发表了江山野的《周恩来的教育论著的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和思想意义》等文章。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该刊在2月号发表了赵一民的《为‘两种教育制度’恢复名誉》、罗国杰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重学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章。1983年《邓小平文选》出版后 特别是‘三个面向’题词发表后，该刊连续刊登学习邓小平教育论述的文章近20篇。1984年《陈云文选》发表后也刊登过文章。《教育研究》还